

田传茂
杨先明 编著

汉英翻译策略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 New Approach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田传茂
杨先明 编著

汉英翻译策略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 New
Approach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翻译策略/田传茂 杨先明编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617-5365-1

I. 汉… II. ①田… ②杨… III. 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536 号

汉英翻译策略

编 著 田传茂 杨先明
审 校 许明武
项目编辑 李恒平
文字编辑 龚 嵘
封面设计 顾 顾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3.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365-1/H·324
定 价 36.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照我原先的计划,四十岁之前从事和研究外译汉,之后研究汉译外。所以,汉译外做得少,研究得也少,仅限于论文摘要的俄译与英译。这次,校友和学友田传茂为我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正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使我对汉译外有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个人的写作仅凭文献,搬用某某学的体系,只算得知识型写作,而有人靠才与识,靠激情,写出的东西不仅有体系,更有血肉,这就是智慧型写作。传茂的《汉英翻译策略》即属后一种。

本书的立论点是“对译”。“对译”之名,实为互译,但显然作者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考虑。全书首先简述翻译的纯理论问题,如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标准等。这部分简炼到位。第一章抓住了汉外互译的实质,从深层次的思维差异入手,辅以文化的差异,最终落脚于语言的差异,这种由里而外的论证,为翻译提供了理论关照。第二章突出汉英互译的四大疑难,即语言难点、思维方式难点、文化难点和非语言因素难点,与前一章形成内在的呼应。上述两章正是此书的第一大特色,即为汉英互译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和第四章则是基于汉英对译的差异,专门介绍破解难题的策略,既有具体的全译策略,又有策略的综合运用,这就形成了此书的第二大特点,即为汉英互译实践提供对策。有理据,有对策,正可以解决全译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

读罢本书,有一点遗憾,传茂所用材料绝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的英译。研究汉译英,我有一种偏见,认为采用母语为英语的译者的作品作为语料最好,正如大山汉语说得再好,也好不过母语,他的汉语听起来可能规范,有时却少了些生气,有时还说些带翻译腔的汉语。我说此话,并非对国内学者不恭,而实在是只有选用地道的汉译英,才能捕捉英语的精气神。另外,我们知道,直译与意译是形式与意义在语际转换中相互矛盾的产物,直译受制于形式,但能转形换态,意译则是以意驭形,对形式施“化”。典型的直译是字词的对译,而直译与意译结合可以产生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等六种策略,这是次一级的全译策略。就本书的第三章而言,若能深入细辨各种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去安排各节内容。这个困惑不仅仅是传茂的,也是译界的,因为近年来译界对宏观理论思考趋之若鹜,而深挖汉外互译事实与规律者愈来愈少。当然,要在一书之中兼论双向语际转化,实在不易,这个问题仍需继续研究与试验,找到切点,尚待时日。

八年前,我供职于江汉石油学院,传茂在荆州师范学院,2002年几校并为长江大学。现在传茂让我精神回家,多谢了。当时,周永模、倪传斌、赵军锋等三五好友,常在一起神侃学问,后来又分居在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而现在长江大学又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借此机会我祝传茂一路走好,更祝长江大学越办越好。

黄忠廉

2007年4月于武昌桂子山

《汉英翻译策略》的写作是一个向各位译界前辈学习的过程,我感恩于先哲智慧的滋润。无论是翻译基本理论探讨,还是翻译实例分析,拙作借鉴或借用了大量中外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的观点与译文,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谈翻译,绕不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翻译的教与学,需不需要理论?我们认为,从学习翻译的角度看,关于翻译活动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何为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以及“何为善译”等,学习者必须知道。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翻译说到底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应当说,那些从实践经验升华而来的理论,对翻译学习者是具有指导作用的,可以帮助他们熟悉双语对译的规律,缩短摸索的时间,尽快地踏上译路。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导言部分旨在帮助学习者了解翻译现象,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原则,翻译的过程,翻译的质量标准以及译者应具有的素养。第一章从思维方式、文化、语言三个方面探讨了英汉语的异同,侧重点在差异上。翻译活动无可逃避地永远在两条思维的轨道上同时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打交道。要学好翻译,对所涉两种语言的异同有全面透彻的了解是基础。语言文化差异必然给翻译带来困难,因此第二章对英汉对译中的各种难点包括不可译因素进行了讨论,以使翻译学习者对翻译的困难有充分的

认识和思想准备。困难并不意味着放弃,而应寻找可行的办法加以克服,缘此,第三、四两章介绍了前人总结出的各种翻译策略与技巧,及其综合运用。

在翻译技巧的讨论和译例的选择上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一方面,译技分门别类,易于讨论和学习,但实践中的任何一次翻译行为,决不是某种译技的孤立运用,而是各种译技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译例为孤立的词语或句子,有断章取义之嫌,与实际翻译活动存在距离,而其优点是学习者可以把某种技巧的运用看得很分明。本着这样的考虑,我们用第四章“技巧综合运用”来弥补第三章将技巧和语篇割裂的缺欠。另外,第三章的十种技巧,有些技巧有部分重叠之处,但侧重点不同,书中已作说明。本书最后设计有翻译练习及参考译文。学习翻译,除了打好理论基础和培养技巧意识外,实践是最终途径。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弥合技巧与实践的距离,使技巧的运用成为一种轻松自如的潜意识行为。对于参考译文,学习者应抱的态度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自己的翻译未必不如人家的翻译,我们反对把名家翻译或参考译文当作至上权威的观念。

黄忠廉和许明武两位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黄先生是我的学长,在百忙之中为拙著作序,并对本书的宏观框架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许先生是我的导师,引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也在百忙之中审校了书稿。在此对两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穆莉萍和李恒平编辑。他们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本书由田传茂统稿并负责其中导言部分以及第一、二、三章的撰写,杨先明负责第四章的撰写以及翻译练习与答案部分的设计。

最后希望译界同仁对本书中的错误不吝指正。书中凡有舛漏,概由本书作者负责。

田传茂 杨先明

I	序
I	自序
1	导言
17	第一章 汉英三大差异
18	第一节 思维方式差异
24	第二节 文化差异
36	第三节 语言差异
48	第二章 汉英对译四大疑难
48	第一节 语言难点
57	第二节 思维方式难点
61	第三节 文化难点
65	第四节 非语言因素难点
68	第三章 汉英对译策略
68	第一节 选词
81	第二节 替换
101	第三节 增减
114	第四节 伸缩
118	第五节 分合
125	第六节 译借
131	第七节 直译与意译
141	第八节 保留与还原
148	第九节 标点符号的运用
152	第十节 加注法

156	第四章 语用翻译:技巧综合运用
157	第一节 句子翻译
188	第二节 常见修辞格的翻译
209	第三节 文化翻译
232	第四节 临时杜撰词语的翻译
235	第五节 语篇翻译
277	第六节 专八译文选析
291	翻译练习
327	参考译文
365	参考文献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古至今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社会交往。但由于人类语言在发音和书写符号上的差异,人们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交际都遇到了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翻译活动便应运而生。

翻译的历史与语言同样悠久。自从有了语言,就有了翻译。翻译可以是语内的,也可以是语际的,前者如同一语言内各方言间的对译以及古文的今译,后者如英汉互译。

口译早于笔译,因为人类语言最初只有声音和意义,没有书写符号。也因此,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口译)无从考证。但我国古代典籍上的有关记载表明,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口译之事。《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的总称。《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由于当时中原文化高于周边民族,两者之间的翻译只限于通达志欲的口译沟通。后来,佛经译者在“译”之前加“翻”,构成“翻译”一词,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笔译,有学者指出,《越人歌》的翻译,即楚王同母弟鄂君子启人将越国舟子的歌词翻译为楚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诗歌翻译(马祖毅,2001:5)。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中国笔译史的发端。真正意义上的笔译,始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时的佛经翻译。说到佛

经,我们立刻会想到《西游记》,想到唐僧西天取经。其实,早在唐朝以前佛经就已传到中国并被译成古汉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自东汉末年至宋代,历时一千二百年,在隋唐时期达到高潮。比较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三国时期的支谦、东晋的道安、六朝的鸠摩罗什、唐朝的玄奘等。

佛经翻译之后的第二个翻译高潮是明清耶稣会传教士和士大夫的科学启蒙翻译,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葡萄牙人傅汎际合译亚里士多德的《寰有论》和《名理探》。《圣经》亦在此时译介到中国。第三个翻译高潮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代表人物为严复和林纾,分别译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经典著作,如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林纾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等。

第四个翻译高潮介于五四运动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世界文学的翻译。前者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学创作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鲁迅、郭沫若、林语堂、朱生豪、陈望道等。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马列著作、东欧和苏俄革命文学作品的译介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来,我国的翻译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编译局将马列著作全面、系统地译成中文,将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著述和政府重要文件翻译成外文。在文学方面,傅雷的法国文学翻译、卞之琳的英国文学翻译、戈宝权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等等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经贸、法律翻译等呈现朝气蓬勃的发展趋势,翻译覆盖面愈来愈广,翻译语种愈来愈多,大大加快了中国与世界接轨、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融合的进程。

有趣的是,西方最早的笔译也是始于宗教经典——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圣经》最初的语言是希伯来语,公元一世纪时译为希腊语和阿拉米语,公元四世纪时出现拉丁文翻译的《圣经》,后由教皇达马塞斯指派圣杰罗姆译为通俗拉丁文圣经,这就是权威的中世纪《圣经》。公元十四世纪时威克利夫首次将《圣经》译成英语。1611年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一直沿用至今。有人认为,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语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两

千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文明离不开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盟,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

自翻译《圣经》始,将近两千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古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卡图卢斯,普卢塔克的作品等也多次被译为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化方面,阿拉伯译者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传统戏剧——能剧、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翻译的本质

关于翻译的本质,圣经中的一段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诺亚逃过洪水劫难之后,东迁到示拿,并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大平原,就在那里从事生产,繁衍子孙。那里土地肥沃,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兴旺,后来成了人口众多的城镇。因为祖先们被洪水冲怕了,担心再遭水灾,诺亚的后代决定动手修筑一座通天的高塔,以防水患。他们学会用石料、烧砖与石灰等材料建造高大建筑物的技术,很快把塔建得越来越高。按计划,这座高塔非常庞大,要能容纳全城的人,因此高度必须达到天顶。上帝耶和华得知此事,决定亲临人间看个究竟。当他见到塔身后,又惊又怒,心想:刚刚繁荣起来的人类,就有如此高超的本领,将来高塔直通到我的宝座如何了得?他决定施神术搅乱示拿人的语言。这样,正在建塔的示拿人彼此不懂对方的话,工程便无法再进行下去,并且发生了许多纠纷,结果是塔未建成,场面却弄得一片混乱。最后,大家只得按语言结群,散居各地。人们丢下工具和材料,承认这是对“亵犯上帝”的一种惩罚。这座建了一半的塔,被称为巴别塔。这是基督教解释世界各民族语言来源的故事。翻译因着这则故事而带上叛逆的色彩,它让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能够跨越上帝耶和华在他们之间设下的语言天堑,继续建造通天塔的未竟事业,实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同。

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叛逆,但不是对上帝的叛逆,而是对原作或原作者的叛逆。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叛逆,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译者无奈的选择。叛逆,毫无疑问,是翻译固有的属性,但是否就是翻译的本质呢?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是决定该事物成为该事物并同其他种类的事物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那么,翻译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国内外不少学者对翻译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泰特勒: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长处如此完备地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以使译入语所属国家的本地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沈苏儒,1998:120)

巴尔胡达罗夫: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蔡毅,1985:1)

奈达: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沈苏儒,1998:131)

卡特福德: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廖七一,2001:128)

沃·维尔施:从本质上看,翻译是一种处于创造和再创造这个“高压区”之中的转换活动。(桂乾元,1995:59)

季羨林、许国璋: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CD1《语言·文字》卷“翻译”条目)

张培基等: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英汉翻译教程》绪论,1983年)

许钧: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翻译,就其根本,是翻译意义。(《辞海新知》,2001年,第5页)

蔡毅: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中

国翻译》,1995年,第6期)

王克非: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中国翻译》,1997年,第1期)

方梦之: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翻译新论与实践》,1999年)

范仲英: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实用翻译教程》,1994年,第13页)

黄忠廉:翻译是有译者参加的活动;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翻译转换的对象是文化信息;翻译是在译作与原作之间求似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

夏廷德:补偿是翻译的本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7期)

赵彦春:既然缺省是必然的,文化缺省自然也避免不了,这就是翻译的本质性特点。(《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杨大亮、张志强:翻译是设法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上海科技翻译》,2001年,第10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外翻译研究者大都从规范研究的视角来探讨翻译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给翻译的本质以人为的规定性,如“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保持内容不变”、“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对等”、“准确而完整”等。他们的定义与其说是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特性,不如说是规定了翻译的原则和译文评价标准。有的研究者过于强调语言文化间的“异”,以至于将文化缺省或对缺省进行补偿视为翻译的本质。这种观点失之片面。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语言文化间的“同”总是大于“异”,思维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是翻译的普遍性,只是特殊的、个别的存在。而本质是事物客观的、普遍的存在。要弄清翻译的本质,首先必须厘定翻译的内涵与外延。

R·T·贝尔(Roger T. Bell, 1991)指出,英语中的 Translation 有三层含义,一指翻译过程(Translating),二指翻译过程的产物,三指抽象概念,既包括过程也包括产物。汉语中的“翻译”,既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许钧,2001)。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的翻译类型三分法更是将翻译的领域从语际翻译扩大到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此外还有机器翻译、手语翻译等等。有人甚至认为思想向语言的转换也是一种翻译(许钧,2001)。本书不准备讨论广义的翻译,仅探究狭义的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从历史看,翻译既可以是声音的转换,也可以是语言形式的转换。在转换的背后是意思的移植或释传。因此,翻译涉及的是人类自然语言,可以是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或历时变体,也可以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这就排除了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排除了手语翻译这种语言与动作行为之间的转换,更排除了非语言的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

狭义的翻译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包括翻译过程和结果。考察翻译的本质不能撇开译者。因其目的不同,译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如全译和变译(编译、摘译等),这直接影响到原语形式的存易。又因其修养高低有别,译者的产出也不一样,如舜译、庸译、佳译等,这直接影响原语意义的传达程度。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搬移意义和信息的语言转换活动,是翻译。因此,从客观的、普遍的意义上看,翻译的本质是具有释义性质的人类自然语言转换。这里不说“转换活动”,是要将翻译行为、过程和结果包括在内。同时也不用“语言活动”、“文化活动”或者“跨文化交际”,因为这不是翻译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人类自然语言”则排除了各种非语言符号的转换形式。用“释义”而不用“对等”、“最切近”、“准确而忠实”等是考虑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的目的及可译性等客观因素。“释义”是翻译内在的但不具有区别性的本质特征,因为其他许多事物如阅读理解中的变换措词、图画的讲解、体育解说员的解说等等都具有释义性质。只有“自然语言转换”,虽然它只是翻译的表象,却反映出翻译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本质特性。

国内翻译研究中存在把翻译的本质同翻译的原则、目标、功能相混淆的倾向。忠实与对等,至多只是某一层次翻译的原则;大体相同的感受,只是译者既定的翻译目标;跨文化交际不过是翻译的客观功能。翻译除了语言形式转换以及永相伴随的意义转渡外,还有两个内在特征:意义的丢失或缺

省以及译文的老化。翻译中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性,一种语言文化的所有特征不可能在翻译中全部保留。例如英语中的第三人称语法范畴,英国文化中“西风”的情感因素等等,在汉语语言文化中就没有对应之物,要么牺牲,要么补偿。但译者必须抱有“保留一切”的愿望,尽自己的努力将损失减至最低。此外,翻译的时间性因素也特别突出。每一个时代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每一代人都希望在翻译中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时代。因此,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复译、新译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二、翻译的原则

所谓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9年,第1549页)。因此,谈翻译原则即是谈翻译标准。古往今来,许多中外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如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M. T. Cicero)的“解释员”式的翻译和“演说家”式的翻译,近代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直译”、“释译”与“仿译”,当代美国译论家奈达(E. A. Nida)的“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支谦和道安的直译、鸠摩罗什的意译,清末严复的“信、达、雅”,当代学者张培基的“忠实、通顺”、许渊冲的“音美、形美、意美”等等,不胜枚举。

面对如此众多、差异很大甚至是两相对立的翻译原则,翻译学习者、教师以及实践者应当何去何从?我们认为,翻译原则的确定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时代文化语境因素。不同的时代对翻译有不同的要求。不可能有适合一切时代的翻译准则。例如我国古代从西域和印度传入的佛经,满足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麻痹控制百姓思想的需要。由于经典本身的神圣性以及本土的儒道思想含有对统治者有利的思想因素,直译与归化式的借用就成为持续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的主流原则。到了清朝末年,时代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通过翻译引入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是为了“以夷制夷”。因此,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突破了佛经翻译所依循的直译和严格的意译,采用了融合增、删、并、改、述、评等手段的灵活翻译策略,即当代学者黄忠廉先生所谓的“变译”,吸取原著精华,甚至锦上添花。

翻译原则还受翻译自身因素的影响,如翻译的类型、翻译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与动机等等。口译与笔译的原则显然不同。文学文本的翻译同

科技文本的翻译原则也不完全一样。同是文学翻译,作为教学用途的翻译与作为艺术欣赏的翻译原则也不一样。同是科技翻译,商业与非商业性的翻译原则又不一樣。翻译原则是一个多层、多元的系统集合,就像一座大厦,由一个基座以及位于其上的许多不同单元构成。谈翻译原则,只能就事论事。本书探讨的是笔译(传统意义上的全译)的基本原则。

依附于当代文化语境的翻译,其原则仍然脱离不了一个“信”字,即忠实。无论什么类型的翻译,基本的忠实是必须的。否则就成了创作或“四不像”。关于忠实的内涵,朱光潜先生在其文章《谈翻译》中说得很透彻:

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做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欣和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

(《翻译论集》,罗新璋编,1984年,第8页)

语言的扞格,文化的差异,译者与作者在社会时代、民族心理、知识架构、写作风格等方面的距离,决定了翻译实践不可能产生绝对忠实的译文。翻译的求“信”,准确地说,不过是求“似”而已。“似”的内容大致包括思想、情感、修辞、风格等方面。思想内容的“似”以至准确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较易做到。而情感、修辞与风格,求“似”已不易,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也就是说,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形式与意义好比鱼和熊掌,常常不可兼得。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具有完全不同或大不相同的发音、书写和意义系统,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渊源与联系。如果原作特点体现在语言形式之上,该特点的再现将非常困难。例如我们中文里可以用字词表示情感,到了英文里不得不用语调。赵元任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他